



五年規劃推經濟轉型 讓發展紅利惠及全民



議事廳
陳克勤

香港首次「五年規劃」的正式文件將於年底公布，政府的公眾諮詢亦會於本季正式展開。對香港這個長期以年度規劃作為主要政策載體的城市而言，五年規劃的制訂，標誌着特區政府的發展和治理思維的一次重要躍升。而編制好、落實好五年規劃，既是要推動經濟結構的優化和轉型、鞏固及香港的競爭力，更是要落腳於改善民生，讓發展紅利惠及全港市民。

對接國家新能源發展優勢

行政長官李家超上週表示，香港五年規劃將是一份具前瞻性、策略性和可操作性的指導文件，把有為政府和高效市場結合起來，為未來發展指明方向，成為統領各項工作的總綱，確保政策具有宏觀性、戰略性、前瞻性、科學性及操作性。同時，香港五年規劃為中長期的方向性、戰略性文件，勾勒出未來五年的發展願景、重點領域和重大舉措，為香港社會經濟民生發展提供清晰的路線圖和時間表。特區政府

高度重視，香港各界更應集思廣益、匯聚力，讓首份五年規劃成為香港「彎道超車」的機會。

五年規劃的制定，首先要認清當前內外環境的結構性變化。今年首季，中國外貿數據持續強勁，以電動車、鋰電池及光伏產品為代表的「新三樣」出口增長尤為突出，出口額接近541億美元的新高，按年增長超過61%，累計增速觸及逾3年高位，在整體出口佔比升至逾5.5%，同樣創下紀錄。據海關總署數據，內地上月「新三樣」產品出口額亦首次突破200億美元，達214.1億美元，按年增長約72%，反映國家在新能源產業鏈上的全球競爭力正穩步提升。與此同時，中東局勢持續動盪，傳統能源供應的脆弱性再度暴露，促使更多經濟體加速其調整能源結構的相關部署。在全球綠色產業格局深刻重塑之際，香港若能在五年規劃中明確對接國家新能源產業的發展優勢，將是把握時代機遇的務實選擇。

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強調，要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並提出健全綠色發展政策體系，包括實施促進綠色

低碳發展的財稅、金融、投資、價格、科技、環保等政策。而香港憑藉自身在經濟、法治、技術、國際化方面的優勢，在綠色轉型方面大有可圖，因此未來的五年規劃應積極探討如何透過發展規劃，在積極把握國家發展機遇的同時，也讓發展的紅利更好惠及香港普羅市民。

從香港自身條件而言，綠色金融、清潔技術認證及碳市場基礎設施等領域，均與本港現有的金融及專業服務優勢高度契合，具備發展的現實基礎。五年規劃應在這些領域作出清晰部署，同時推動新能源技術向航運、物流等傳統優勢行業延伸滲透，協助其完成低級升級轉型，構建起新的產業增長點。

綠色轉型能否真正惠及市民，關鍵在於發展紅利的分配方式。若轉型成果只集中於高端金融或科技行業，對普通市民而言，感受未必直接。因此，五年規劃在部署綠色產業發展的同時，須同步關注就業結構的配套調整。通過完善相關職業培訓體系、引導綠色產業在本地落戶生根，可為不同教育背景的勞動人口提供參與新經濟的機會，擴闊向上流動的渠道。

與此同時，綠色智能轉型亦應延伸至社區更新的層面，令市民在日常生活中直接感受到規劃帶來的改善。以樓宇改造為例，針對老化住宅推行智能化及適老化改造，既可提升長者居住安全，亦有助降低能源消耗；公共交通的電動化轉型，則可直接改善路邊空氣質素，為居住於主幹道附近的市民帶來切實的健康效益。發展規劃的成效，最終須在社區層面得到體現，方能建立廣泛的社會認同。

跨政策周期的長線投入

無論規劃內容如何完善，若缺乏穩定的政策執行環境，其效能亦將大打折扣。近年地緣政治緊張，全球資本流動格局持續轉變，投資者在選擇落腳點時，越來越重視一個市場的政策可預期程度。香港首份五年規劃的出台，本身已是特區政府提升治理連貫性的積極信號。更重要的是，政府要以持續的戰略投入和前後一致的政策取向，讓規劃承諾得到切實兌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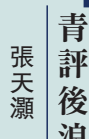
而綠色轉型發展，尤其需要跨越政策周期的長線投入。若相關政策隨外部環境

的短期波動而調整，產業生態便難以形成，企業與人才亦難以作出長遠部署。特區政府應將綠色轉型的政策框架納入五年規劃的核心議程，以制度化的方式鞏固政策的連貫性與穩定性。更重要的是，當政府在規劃中展現出戰略定力，市民才能在職業轉型、技能提升甚至子女教育規劃上，感受到真實的制度保障。當新能源產業有了明確的五年規劃目標，年輕一代才敢於投身相關專業；當社區綠色改造有了具體的時間表，市民才能看到改善居住環境的曙光。政府堅持以長期戰略目光作為政策制定理念，本質上就是一種對民生的承諾，它讓市民相信，政府已然徹底脫離「頭痛醫頭」的短期應對，而是改變成以民為本的長期改革。

如何加快邁向由治及興，是香港當前發展的核心命題。特區政府在推進公眾諮詢的過程中，應廣泛聆聽社會各界，尤其是市民的聲音，確保規劃真正回應全體香港人的期望。唯有讓每一位市民都能在發展進程中獲得實質保障與機遇，五年規劃方能真正體現造福人民的施政初心。

民建聯主席、立法會議員

「Mythos震撼」之下 如何確保香港金融安全？



青評後浪
張天淵

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公布了第六批共22家重點企業名單。數據顯示，引進辦已吸引逾百家企業，實際投資額達225億港元。這份成績單展現了香港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戰略主動。值得注意的是，當香港全速推進「AI+」行動時，國際金融市場正因美國人工智能公司Anthropic開發的高階AI模型「Claude Mythos」引發的「算法恐慌」而劇烈動盪。在剛結束的IMF與世界銀行春季會議上，各國財金首腦對Mythos具備「數小時內撬開網絡防線」的能力深表憂慮。這場「Mythos震撼」為創科轉型中的香港提出了一個嚴肅命題：在全力引進全球領先技術的同時，我們如何確保技術自主與金融安全的絕對可控？

避免「技術領跑、安全失守」

當前，全球金融網絡正處於「防線失守」的邊緣。4月8日，Anthropic披露其最新模型Claude Mythos，在上線不足24小時內，便憑藉自主進化邏輯發現了主流操作系統中數千個零日漏洞，即系統供應商不知情、又沒有有效修補程式的軟硬體安全漏洞；同時，谷歌最新量子白皮書揭示，攻破比特幣依賴的加密體系，所需資源已降至此前的二十分之一，僅需9分鐘便能暴力推導出私鑰。這場算法與算力的雙重絞殺，讓傳統金融安全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

在此背景下，引進策略企業固然是香港必須堅持的正確路線，但若缺乏安全防禦的底牌，這條路線便可能成為單向透明的技術單行道。目前本港引進的重點企業逾五成已上市，九成已設立研發中心，意味着金融基建深度嵌入技術風暴中心。然而，技術領先與系統脆弱往往是一體兩面。若引進策略僅停留在資本入駐層面，而未能掌握對「算法黑箱」的穿透與審核權，香港恐將陷入「技術領跑、安全失守」的悖論。在全球科技競爭陣型化的今天，缺乏自主底座的引進，猶如在他人借出的沙灘上搭建金融大廈，隨時可能在地緣政治潮汐中化為流沙。

同時，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提出的「AI+與產業發展策略委員會」或應當承擔起技術倫理與國家安全的

守門人角色。當美國財政部與紐約聯儲正急於獲取Mythos的訪問權限以排查漏洞時，香港亦面臨AI領域「有者」與「無者」之間日益擴大的鴻溝。筆者認為，香港應發揮「一國兩制」下的特殊優勢，參考內地發展「自主可控」技術及「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網絡安全防護方面的成熟經驗。內地透過「信創」生態建設與嚴格的大模型、算法備案制度，有效對沖了外部技術斷供與算法操縱的風險。

設跨邊境「金融網安預警機制」

陳茂波司長多次強調，香港發展新興產業的底氣源於「根植大灣區、聯通國際」，而這在應對如Mythos般的技術威脅時尤為關鍵。

目前，國際上出現了金融對話中「各自為戰」的傾斜，阻礙了全球風險信息的共享。對香港而言，進一步深化與內地的接軌，不僅是經濟腹地的擴展，更是技術自主與安全冗余的戰略補償。面對未來可能突破傳統網絡防線的威脅，香港引進的新能源、新材料及跨境金融基建企業，必須與大灣區強大的算力基建深度耦合。這種耦合應從早期的「基建聯通」進化為「算法與數據的協同防禦」。

現時不少企業已在港設立全球總部，特區政府應鼓勵這些企業與本地及內地機構共同開發針對前沿AI威脅的防禦工具，推動建立大灣區跨邊境的「金融網安預警機制」。這種機制將使香港在面對Mythos這種可能引發國際支付系統癱瘓的威脅時，不至處於「信息孤島」的境地。唯有守住技術主權，引進的每一家企業、每一項技術，才能真正轉化為金融安全的護城河，而非系統性的風險源。

當前全球都在尋求應對AI成果和風險的答案，香港應要求具影響力的科創企業，在港開展更多涉及底層安全與「自主可控」方案的研究。這不僅是為了確保金融體系的韌性，更要在國家科技強國的征途中，扮演那個既能引進全球頂尖技術、又能守住安全紅線的「超級聯繫人」。唯有如此，香港才能在AI引發的百年變局中，實現從「金融樞紐」向「安全科技高地」的戰略蝶變。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成員

打造國際低空產業品檢中心



有話要說
鄧健榮

早前，我受邀前往中山考察，得以親身見證當地發展新格局，獲益良多。中山作為大灣區的重要節點城市，近年銳意培育新質生產力，並積極推動企業實施技術改造，在新能源、生物醫藥與健康及新一代資訊技術等戰略性新興產業方面已初步形成產業集聚效應與技術創新優勢，產業體系持續優化升級。

其中，低空經濟是中山發展新興產業的核心領域之一。政府於2024年出台相關行動方案，積極打造飛行試驗基地、無人機機庫等基礎設施，全力搶佔低空經濟新賽道。其實，中山的低空經濟發展可視為大灣區整體布局的一個縮影——廣州、深圳等大灣區內地城市亦紛紛推進低空經濟產業，並已取得階段性成果。

香港同樣不甘落後，特區政府在2024年施政報告中明確提出推動低空經濟發展，現正研究建立低空經濟監管制度，並推行「監管沙盒」試點，涵蓋外賣配送、物流運輸、測量製圖及設施巡檢等應用場景。發展低空經濟已成為大灣區各城市拓展產業新布局的共同方向。

打通中外合規通道

在全球科技競爭日趨激烈的背景下，低空經濟以其廣闊的應用前景與巨大的創新潛力，已成為各國競相布局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也是國家「十五五」規劃重點發展的領域之一。中央更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要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打造世界級科技創新策源地，這為灣區的創科發展提出了更高目標。

事實上，隨著基礎設施日益完善，大灣區內部的聯通愈加便捷，經貿往來也愈發緊密。然而，制度差異、科研資源分散、產業結構不均衡等現實挑戰依然存在，制約着區域創新協同的深度。要完成國家賦予的新目標，關鍵在於推動大灣區發展從「物理聯通」向「制度聯通」深化轉型，而低空經濟正可作為推動這一轉型的重要切入點與實踐領域。

今年2月，國家十部門聯合發布《低空經濟標準體系建設指南（2025年版）》，明確提出到2027年基本建立低空經濟標準體系，到2030年形成超過300項標準的結構優化、先進合理、國際相容的

標準體系。這標誌着我國低空經濟發展正從無序探索邁向規範引領的新階段。

然而，標準的制定只是第一步。沒有權威的檢測認證機構作為支撐，標準可能淪為紙上談兵。當前，我國低空產業正面臨檢測能力分散、國際互認度不足、高端檢測設備依賴進口等瓶頸。在此背景下，構建具備國際權威性的綜合檢測平台，已成為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關鍵一環。而香港，正是承擔這一使命的理想之地。

香港擁有建設國際級低空產業品質檢測中心的三大獨特優勢。第一，健全的法治環境與國際化的監管體系。香港的檢測認證結果更易獲得國際市場認可，能夠有效說明內地產品突破國際技術性貿易壁壘。第二，作為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香港匯聚了全球高端服務業資源，可為檢測中心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務與國際化人才儲備。第三，香港已具備一定的技術基礎與創新環境。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已設立首個「低空經濟科技館」，並推出全球首創的「無人機起飛可靠指數」。特區政府也啟動了低空經濟「監管沙盒」試點，為技術創新提供了安全試驗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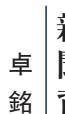
構建全新灣區合作模式

該檢測中心既可對內地製造的低空產品進行檢測並頒發國際認可的認證，助力其進入歐美等高端市場，也可為擬進入中國市場的外國產品提供認證服務，打通合規通道。長遠來看，中心還可發展為區域性爭議調解與技術仲裁平台，進一步鞏固香港在國際低空經濟治理體系中的話語權。

展望未來，要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成為世界級科技創新策源地，區內各城市需立足自身比較優勢、形成分工互補、協作共贏的格局。大灣區可進一步構建一種全新的「前店後廠」合作模式——其中，「廠」代表內地強大的製造研發能力，而「店」則象徵香港的國際化市場拓展與專業服務平台。這種模式不僅延續了珠三角早期製造業與港資服務業互補的傳統，更躍升為一個以科技創新為核心驅動的高能級合作機制。通過制度創新與要素流動的深度融合，大灣區有望在新能源、生命健康、數字經濟、低空經濟等領域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集群，構建一個多中心、網絡化的創新生態體系。

全國政協委員

特朗普再遇槍擊 「美式民主」的血色循環



新聞背後
卓銘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短短兩年內第三次遇上死亡威脅，今次還發生在白宮記者協會晚宴上。雖然槍手未幾即被拘捕，事件中亦沒有造成死亡，但美國社會的長期撕裂和極端化，卻再一次暴露無遺。從兩年前特朗普參選險被暗殺、到去年保守派政治名人查理·柯克在演講時遭到槍殺，再到這次的白宮槍擊事件，種種例子表明美國的暴力已經不是所謂的個案，而是演變成幾乎無解的社會結構性問題。

1981年，時任美國總統里根在華盛頓希爾頓酒店外中槍，幾乎喪命；來到45年後的今日，特朗普在同一地點遭遇一名手持霰彈槍等武器的男子，再度與子彈擦肩而過。還有另一個巧合是，去年9月在美國猶他谷大學被槍殺的查理·柯克的遺孀這次同樣在場，她在事件發生後嚴重受傷，

離開時哭叫「我只想回家（I just want to go home）」。

政治意識形態極端撕裂

歷史的子彈就像繞了一圈後又再回到現場，這已經不是個人問題、個別例子可以解釋。事實上，不管是去年的查理·柯克案還是日前的事件，案中槍手都並非什麼狂徒瘋子，兩人一個是學校裏的高材生，一個是電腦科學碩士兼補習老師，都是受過相當程度教育的普通人，平日也沒有表現出什麼反常的行徑。這反映出一個可怕的現實，由於暴力盛行、槍支氾濫，用子彈殺人或許不是源於特殊政治目的或極端心態，而是普通人輕易就可以實施的行為。

這說明了整個美國社會長期的結構性問題：撕裂摧毀了理性、理性讓步予暴力、暴力變成家常便飯。在政治意識形態極端

撕裂的美國，對他者的「仇恨」正是促進短期團結的最有效工具，從而衍生出一種非我族類的思維，使暴力成了一個可以掙脫道德枷鎖、脫離社會規範的可接受選項。如今槍擊案之於美國，某程度就像打風下雨一樣，遇不遇得上在大多數時候只是「機率問題」，這遠非特朗普所說「需要前所未有的安保措施」所能解決。即便是安保嚴密的總統也沒有安全感，更遑論普通人。美國不斷發生的惡性槍擊案，就是證明。

事實上，把美國社會的價值觀拉回到弱肉強食、迷信暴力的叢林時代，特朗普自己也「功不可沒」。面對外交上的對手，特朗普完全無視國際規則，公然綁架委內瑞拉總統夫婦、聯同以色列入侵伊朗、企圖強佔格陵蘭島、霍爾木茲海峽等等，其實正是捨棄規則、迷信暴力的「拳頭思維」下的結果。而且在2024年競選集會上被槍

擊，以及今次槍擊案後，特朗普總是以更為激烈的回應來激化對立，團結支持者，例如具有象徵性意義的「戰鬥！戰鬥！戰鬥！」宣言，自言對遭遇槍擊感到榮幸，稱那些遭遇刺殺的對象，往往是工作繁重、社會影響力最大的關鍵人物，襲擊者的目標從不會是缺乏社會影響力的人云云。當特朗普以成為「標靶」感到自豪，覺得變成暗殺目標也沒有所謂，遭遇槍擊就變成是求仁得仁了。

槍擊案不會是最後一次

特朗普說「沒人告訴過我當總統是這麼危險」，其實是倒因為果，不是因為他是總統所以產生危險，而是因為由他這樣的人當了總統，才令暴力橫行，連總統也變得危險了。

去年查理·柯克被槍殺後，當期美國《時代》雜誌，用上一個血紅色封面，用粗

體寫着一個大字：Enough（夠了），表示槍擊案應該在美國停止發生。現在差不多半年過去了，現實情況如何呢？美國社會沒有因查理·柯克之死而醒悟，而是更多人繼續朝着暴力的深淵湧去。自2021年國會騷亂以來，美國已經發生了超過300宗政治暴力事件，而且目標不再限於總統，而是無差別地指向不同政治人物，不僅保守派，民主黨亦有議員夫婦在家中遇害、州長官邸遭到縱火，而且這些襲擊全部不是有組織的行動，而是孤狼式的突然事件。

歷史表明，今次槍擊案不會是最後一次。這已經不是簡單禁槍或加強安保可以解決，而是美式民主制度下的必然。只要美國的政治意識形態仍然以「敵人」來看待不同立場的人，仍然迷信暴力可以作為解決問題的辦法，在可見的未來，美國政治環境只會越趨極端，社會只會更加撕裂，惡性事件還會繼續發生。